

从游士到儒士

——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

查屏球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主要研究了从汉到唐士风与文风的关系,从士风演变的历史背景中揭示各阶段文学风尚与文学观念变化的原因。全书五个部分,序论通过分析现代学术史上一场争论,反思了文学史研究中古今融合及古代文学史研究现代化的问题;第一章分析了汉武帝士风转变对文人心态的影响,并着重通过简帛文本的特点说明了其时士人学风与文风的关系;第二章以江左士风为背景,分析以玄学为核心的名士文化与偏重儒家意识的寒士文化关系及在当时文论中的表现。第三章以魏晋名士文化传统在初盛唐的沿续与变化为背景,说明盛唐文学特点,解析构成盛唐之音的文化因素;第四章以儒士文化群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活动为中心,说明儒士精神对文学发展的作用。第五章以中唐儒学复兴为背景分析中晚唐文风,其中又侧重于从学风的变化上论述唐诗走向宋诗的历史必然性。最后的附论考证了唐代文学传承中的几个文献方面的问题。

著者简介:查屏球,生于1960年12月,安徽铜陵人,文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兼治“网络人文资源运用”。目前学术兴趣集中在文本载体与文学、文学评点与文学传承、唐诗语言艺术等方面,曾出版专著《唐学与唐诗》,发表《原始阅读方式与早期的文本释读符号》等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序

王水照

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关于士风与文风的问题渐渐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与其他众多学术话题的回归一样,这也是对已中断多年的学术话题的回归。早在20年代时,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开始运用现代学术理念研究士风与文风的关系。如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谢国桢《明末清初士人活动》、王瑶《中古文学论集》,就是其中的经典之作。近年来,随着西方学者关于知识分子论著的译介以及国际汉学界相关成果的不断引进,当代学人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其学术方式与学术视角也有了较新的变化,研究的空间也不断扩大。由社会风气到士人心态,由地域文化到生活方式,研究内容也越来越细化。中断的学术命题不仅得到了延接,而且还滋生出新的学术活力。相对于先前强调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士风与文学创作关系更为密切,从这一角度认识文学史可深入地揭示各时期文学风尚的历史底蕴。查屏球先生近十年来一直关注这个问题,由汉及唐,锐意探求,精进不辍,所得粲然可观,本书就是这些收获的一个总结。

本书论及的范围较广,与传统的论汉唐文化有所不同,作者不只是专注于汉唐盛世气象,而是从思想史角度将汉唐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阶段与发展过程。作者认为从汉武帝“独尊儒学”到东汉经学一统

天下,再由六朝隋唐玄学与佛学的兴盛及儒学对玄、佛的汲取到新儒学的萌生,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士人文化传统经历了确立、衰弱、蜕变与新生几个阶段,各时期文学精神与风尚的变化都与这一儒家传统的起伏承转息息相关。作者以此为中心具体分析了由汉到唐这一阶段士风与文风的关系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关于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但是,以中唐至北宋作为古近代分期却是近年来比较有影响的看法。仅从儒家文化传统演变看,由汉到唐,以儒教思想为核心的士人文化经历了与玄学、佛学、道教并存兼融之后,从中晚唐开始,传统的文化要素在新儒学的组合下,形成了新的道统,自宋之后,士人的人格形象就基本定型了。如严复所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三册,页688,中华书局,1986年)后世治学术者多以汉唐经学与宋明理学对应,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历史是一个动态积累的过程,相对于后期成熟与定型的社会思想而言,由汉到唐是古典时代的发展期。现代有人称之为中国文化的青春期,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想这里并不含有价值判断的意思,我们不能像前人那样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观念,无端将之上升到“复古”标本的高度,而应将其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考察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与原因。本书不停留于一般的“气象”与“境界”这些概念中,而由具体史实探寻作品背后的历史意蕴,考察各时期文风脉络的承转线索,这种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本书通过一系列的个案研究,提出了一个个比较有见地的观点。如:作者认为由汉至唐,随着士人的主体形象经历了经师、名士、文士、儒士几个阶段,士人精神指向经历了圣人崇拜、名士崇拜、才子崇拜及儒士崇拜几个时期。文风的内在思想也经过了经学化、玄学化(包括佛学化)、儒学化几个过程。当战国游士沦为专制王权的一家侍臣后,士人的命运就与王朝政治完全捆绑在一起,士人的价值唯有在王朝政治体系里才能兑现,而这一切又以牺牲思想的自由与人格的自尊为代价。魏晋名士以玄风张扬个性,以缘情绮靡的文章代替章句之学,但在放弃

汉儒经师章句同时,又淡化了士人的政治责任感与参与精神,这使得此后的文风在走向唯美的途中,又因缺乏社会关怀而显得贫血无力,只有寻求外在在刺激以获得审美满足,南朝士风正是这一走向的一个结果。唐代昂盛的国势为名士风流注入了政治上的进取精神,中古以来形成的追求人格独立的名士传统在盛唐文化中得以充分弘扬。至中唐后由科举制培育出的新一代士人开始建立起新型儒家化的人生哲学,形成了才学与儒理合一的人格观念与文学理念,名士化、才子型的激情融入到理性化与知识化的成熟之中,文风也随着整个社会文化一起向宋型文化方向转变与发展。不难看出,作者与所有关注这一课题的学者一样,也是带着特定的现实思考来从事这项研究的。如其中所论述的经师、名士、才子、儒士等几种人格观念涉及集体人格与个体思维、传统传承与开拓创新、社会规范与自由意志等问题,显然是由一种人文危机意识所激发出的学术思考。德国哲学家克罗齐曾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页69,商务印书馆,1982年)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赫曾言:“史学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现在——保持不断的接触”。“为了阐明历史,史学家往往得将研究课题与现实挂钩……只有通过现在才能窥见广阔的远景,舍此别无他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永远静止不变的景象强加给每个阶段,史学家所要掌握的正是它在每个阶段中的变化。但是,在历史学家审阅的所有画面中,只有最后一幅才是清晰可辨的,为了重构已消逝的景象,他就必须从已知的景象入手,由今及古地伸出掘土机的铲子。”(《历史学家的技艺》,页38,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近年来,这种充满现实关怀与当代意识的学术理念已渐有淡薄之势,其实,对于一个信守“实事求是”学术规范的学者来说,这是一种更具挑战性的学术探索。

本书采用了以点带面的研究方法,从各个阶段中选取了一些具体的问题作个案分析,并以这些个案研究来反映这一段历史中士风与文风演变的过程,以及士风对文风的具体影响,从士风演变的历史背景中揭示各阶段文学风尚与文学观念变化的原因。本书各章先以“序论”阐明基本观点,再分节作专题研究。全书五章,序论通过分析现代学术史

上一场关于一联唐诗的争论反思了文学史研究中古今融合的问题,为本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确立一个理论思路。第一章先以司马迁一例说明随着汉武文治的加强,封建王朝也完成了思想文化的集权专制体系,战国以来的游士之风在思想与行为上都失去了自由的空间,士人处于向往战国游士传统与信守儒家君臣观念的矛盾中;再通过分析汉儒对《诗经》、《楚辞》的释读方式说明汉人特殊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又利用近年竹帛与纸本的考古成果,通过研究当时文本载体形态的变化来考察东汉后期的文风变化。从士人生存方式、文学观念、文本形态几方面说明了两汉士风与文风的关系。第二章以江左士风为背景,通过对刘勰、钟嵘、萧统文学观的分析,说明中古士人在玄学思潮中所表现的文化性格,指出一方面以玄学为核心的名士文化继续发展着纵情尚美的文学观念,另一方面下层寒士也开始以儒家意识对之进行了纠偏与改造。第三章通过分析陈子昂、河洛儒士、李白的心态与学术背景,说明魏晋名士文化传统在初盛唐的沿续与变化,解释构成盛唐之音的文化因素,分析盛唐文风与士风的内在关系。第四章将元结与杜甫等作为一个群体,着重分析安史之乱期间儒士文化的精神崛起,说明儒士复古精神与复古诗风新变的关系。第五章以中晚唐儒学复兴思潮为背景,选择几个个案说明从大历到大中士风与文风特色。先以大历京城诗人与贞元江南诗人两个群体为例说明安史之乱后士风与诗风的具体走向。再由春秋学派、韩愈、李商隐等人著述特点为例,分析中晚唐文风,其中又侧重于从学风的变化上论述唐诗走向宋诗的历史必然性。最后的附论考证了唐诗传承中的几个相关问题。全书结构看似松散,但在这种开放式的组合中,也保持了相当的整体性。这不仅在于全书有一个清晰的历史线索,还在于所论述的问题本身就有特定的连续性,都是各时期士风与文风的焦点,作者选择不同的切入点考察历史,将这些切入点组合起来,就能比较全面地展示出各时期士风与文风的特色。

本书在形式上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各章节都配有相关的文物图片资料,这些图片多数是文物图版,有些是作者现场拍摄的,既有较高的学术性,又具有一定的可读性,读者借助这些图景可以建立起更加具象

化的历史空间。作者一向关注文物考古,注重收集相关材料。他认为自己从中曾获得了对研究对象更真切的感受,也希望能将这种体验再转达给读者,改变一下学术著作的外观形象。近来出版界惊呼现在的读者已进入了“读图时代”,我想作者这种努力也是一种值得一试的尝试。

本书在学术方法上也具有多样性的优长,有宏观的理论阐述,也有微观的考据实证;有思想史研究,也有社会学推论;有群体阶层的归纳,也有个体的心理分析,可谓汉宋兼擅,中西皆取,这也体现出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中这一代学人的特点。回顾这二十年的学术史,80年代后期可以说是“方法论”时代;90年代是对已经失落的学术传统回归的时代,现在大体上可以说是进入到规范化操作的时代了。有人说90年代前有思想无学术,90年代后有学术少思想。其实,这一变化并不是在汉宋学之间作机械的钟摆。二十多年来,学术模式的不断变化,既体现了这一代学人在学术话语形式上的徬徨与不安,也反映了他们力争独立话语权的强烈意识。他们一方面感到传承本土学术传统的重负,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日益发展的国际汉学界的挑战。面对厚重的传统与全球化的学术思潮,他们常有失语的痛苦,却又不能不发出自己的声音。不拘一法,转益多师,在博取众善中走出自己的路,成了他们的自然选择,也构成了这一代学人的特色。这也是我对作者的期望。

2004年10月21日

目 录

序	1
引论:关于文学史研究现代化的思考	1
第一章 游士的失落与经师的文学	23
汉武时代士人精神的嬗变	25
司马迁心态矛盾的构成与作用	35
汉儒章句之学与经学化文学批评	46
由出土文献看秦汉俗文学	65
《楚辞章句》与文学释读模式	84
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风	117
第二章 名士的风流与文心的自觉	148
刘勰对风骨论儒家化的改造	150
文才崇拜心理与宗经意识的整合	180
齐梁寒士心态与刘勰的人生追求	204
南朝思维定势与《诗品》批评模式	229
《文选》诗赋立目与宫体诗审美机制	244

2 从游士到儒士

第三章	尊文的时代与文士的自信·····	259
	家风、时风与陈子昂风骨精神·····	261
	玄宗时代经学的窘境·····	282
	天宝河洛儒士群与复古之风·····	300
	李白北上幽州考·····	317
	盛唐名士文化沉落与李白悲剧·····	334
	李白晚年诗风的变化·····	354
第四章	安史之乱中的士风与诗风·····	377
	由墓志年号看安史之乱中士人心态·····	379
	忧患之诗与儒家政治伦理的重建·····	385
	儒家民本意识的上升与循吏之诗·····	399
	安史之乱中儒士复古诗风的新变·····	414
	杜诗与新儒学的萌生·····	433
第五章	诗人的学人化与文士的儒士化·····	464
	元、王集团与大历京城诗风·····	466
	江南诗人与大历贞元诗风之变·····	483
	中唐解经别派与儒学的新变·····	508
	韩愈《论语笔解》真伪考·····	528
	晚唐类书与李商隐《金钥》考述·····	539
附论		
	新补《全唐诗》一百首——高丽《十抄诗》中所存唐人佚诗·····	550
	《二十四诗品》的另一传本·····	595
	“李攀龙《唐诗选》”评点本考索·····	610
	后记·····	630

第五章 诗人的学人化与文士的儒士化

陈寅恪先生以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页 29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今人著文学史以此为界，正是基于对这一历史卓见的认同（如章培恒、骆玉明所编复旦版《中国文学史》）。从安史之乱中走出的一代士人，虽然，在精神上仍然向往盛唐的气象与风度，也不乏浪漫的生活情调，但是，严酷的政治现实，艰难的生存环境，已使他们深深感到昔日的名士风流已无立身之所了。他们不可能像王维那样奔走于王府与权贵之门，他们所能依托的只能是王权政治给予他们的仕途宦场，他们的命运、荣辱与王权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思想意识上，他们仍保持了开放化、自由化的唐人本色，既可诚心诚意地在道观与佛寺中求拜，又可在乡校与国学里倡言尊儒崇古，然而，以国为家的观念已成为高度自觉的政治意识，以君国为中心的政治立场也成为立身的人格底限，而不再像六朝之臣那样袖手旁观王权的兴替。儒家化的政治信仰与开放式的精神自由，构成士人内外两个思想空间，儒士又成为正统的人格形象。在经历了几百年的磨

合之后,本土化的佛学已展现出全新的面目,佛学形而上的思维方式推进了中土士人对儒家教义的理性化思考,禅学狂潮冲洗了汉儒章句经学的思维方式,传统的以礼学为中心的经学开始了向性命理学的转变;随着新进士科的发展,知识阶层的扩大,知识的积累与学术含量在科场竞技中的比重也愈发突出,士人由单一的清词丽句的竞争转向讲求辞章与才学兼重,诗家的才性与学人的厚重都成了士人注重的素质。唐后期国力衰弱了,但商品经济却仍有较大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多,都市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进士科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一方面他们多不是成长于豪族庄园,多数是随父辈游宦于各个城市;另一方面,在动荡的时局中,他们也难以享受以前庄园生活的宁静,为了备考,他们多旅食京华多年,较早就接受了都市文化,并具有一定的市民意识。以上这些因素自然会表现于时人的文学创作中,这使此后的文风出现四个明显的精神指向。这就是政治化、理性化、学人化、世俗化。这四种倾向是与中唐后士人的生存方式与精神追求不同层面的反映,也体现士人的主角由古典特权贵族之士转向近代知识化科举绅士的历史趋势。

元、王集团与大历京城诗风

大历十才子若仅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在唐诗史上的地位既不能与前期的沈宋、王储相比,又无法与后期的韩孟、元白并论。但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它又是盛中唐士风与诗风承转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文人群体的产生原因与生存方式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以下试从这一点入手来探讨大历诗风的一些历史内涵。



王维《长江积雪图》 现藏于美国火奴鲁鲁艺术博物馆。

一、大历重文臣政策 与天宝余气

唐代宗与唐肃宗不同。肃宗因乱得位,不尽合法,政治神经比较脆弱;内听皇后张良娣,外任宦官李辅国,只以私臣保其位,政治上没有什么新的作为。代宗为太子时一直是处于平乱前线,对唐王室的危机有更具体的认识。他即位后,既最终平定了安史之乱,又两次抵御了吐蕃的大规模入侵,这使得近十年来一直处于危机之中的唐王朝似乎有了一些中兴之象。代宗已感受到唐室不亡

实有赖于天下士人对王室的向心力。为改变战乱中武将擅权的状况，他开始重用文臣，有意提高文士的地位，采取了一些收笼士心的措施，并着力提高文士的吸引力。如《旧唐书·代宗纪》记：“（永泰二年）三月壬辰朔，诏左仆射裴冕、右仆射郭英义、太子少傅裴遵庆、检校太子少保白志贞、太子詹事臧希让、左散骑常侍畅璀、检校刑部尚书王昂高昇、检校工部尚书崔涣、吏部侍郎李季卿王延昌、礼部侍郎贾至、泾王傅吴令瑶等十三人，并集贤院待诏。上以勋臣罢节制者，京师无职事，乃合于禁门书院，间以文儒公卿，宠之也。”集贤院是玄宗开元年间所设的一个文化机构，其间集中了当代最著名的文人学者，前期主其事者即是文坛领袖张说。它独立于中书省、尚书省之外，能与君王保持更亲近的关系，一直是文士学人最荣耀的职位。他以文儒公卿之职安排这批靖难勋臣，也就是要撇开官阶等第限制，将权力中心从武人那里移到文臣手中。此举即开了唐中后期翰林承旨学士之制。代宗还安排文臣任方镇大员以代替武将，如任王缙为河南副元帅、北都留守等职；又遣鲍防为河东节度使。史称人乐鲍防之治，代宗诏图形别殿^①。当时宰臣元载、王缙、崔祐甫、常袞、杨炎等皆有文名，如《旧唐书·元载传》称：元载“好属文”，“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天宝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诏求明庄、老、文、列四子之学者。载策入高科”。同书《王缙传》称：“少好学，与兄维早以文翰著名。”“连应草泽及文辞清丽举。”^②又称：杨炎“文藻雄丽”，“自开元已来，言诏制之美者，时称常、杨焉。”杨绾“尤工文辞，藻思清赡”。“（天宝十三载）取辞藻宏丽外，别试诗赋各一首，制举试诗赋，自此始也。时登科者三人，绾为之首”。常袞“文章俊拔，当时推重”。崔祐甫亦是进士科出身^③。他们都是玄宗时代进士科文化培养的一代。代宗对勋臣大将也存有戒心。但是，他不像肃宗那样一样仅依靠宦官李辅国等控制权力，而是重用了一批进士科出身的大臣。这既分

① 《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九《鲍防传》，页4949。

②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八，页3409、3416、3419。

③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八。页3429、3437、3445。

解了地方军将的权力，又遏制了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还权于朝，使群臣对王室有了一定的信心。如其即位不久，即罢除在肃宗时被尊为尚父的宦官李辅国判元帅行军及兵部尚书、中书令等职，还权于朝臣，许朝朔望^①。广德二年群臣在避吐蕃入侵时，“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蕃寇犯京师，罪由程元振，请斩之以谢天下。上甚嘉纳”。^②后又利用元载除去宦官鱼朝恩。终代宗一朝，宦官专权情况并不严重。外廷众臣都能有所作为，士人对王室多存有较强的向心力。代宗还采取了一些延揽士人的措施。如《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三记：

（大历六年），四月戊午，御宣政殿，亲试讽谏主文、茂才异等、智谋经武、博学专门等四科举人。帝亲慰勉，有司常食外，更赐御厨珍饌及茶酒，礼甚优异。举人或有敝衣菜色者，帝悯之，谓左右曰：“兵革之后，士庶未丰，皆自远来，资粮不足故也。”因为之泣下。时方炎暑，帝具朝衣，永日危坐，读太宗《贞观政要》。及举人策成。悉皆观览。一百余道。将夕，有策未成者，命大官给烛，令尽其才思，夜分而罢。时登科者凡一十五人。^③

由此可见代宗对文人的重视，这使得因战乱而遭贬值的文人又有了以文求仕的希望。

除了政治需要之外，代宗朝文人受到重用，也是唐进士科文化自身发展的一个历史趋势。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稿》卷上云：“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其宰相大抵为以文学进身之人。此新兴阶级之崛起，乃武则天至唐玄宗七八十年间逐渐转移消灭宇文泰以来胡汉六镇民族旧统治阶级之结果。”^④崛起于武后时代的进士阶层，其政治地位是在不断上升的。开、天时代是唐王朝极盛之世，也是进士科文化得以充分发展

^① 见《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页269。

^② 见《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页274。

^③ 《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三。

^④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页2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的时代。它造就了一支空前庞大的以诗赋为业的进士文化群，其成员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我们由上述宰臣的出身特点可以看出，大批诗赋之士进入权力中心正是从代宗朝开始的。这是开、天进士科文化在战乱后的再度沿续，实质上也是开、天文化的一个历史惯性。近十年的战乱中断了士人以诗赋求仕的生活道路，但并没有改变人们以诗赋取士的价值观念。《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唐代宗广德元年六月”记：礼部侍郎杨綰上疏请停进士、明经两科，改为汉代的察举制，给事中李栖筠，左丞贾至，京兆尹严武并与綰同。然而，“宰臣（指元载——笔者注）等奏以举人旧业已成，难于速改”，“代宗以废进士科问翰林学士（指常袞——笔者注），对曰：‘进士行来已久，遽废之，恐失人业。’乃诏孝廉与旧举兼行。”^①沿续了上百年的以诗赋取士的价值观念已是根深蒂固。由科举进身的士人在进入权力中心后必然保持了这一价值取向。如《旧唐书·元载传》称：“元载自作相，常选擢朝士有文学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将以代己。”又：“王缙兄弟有诗名于世，缙既官重，凡所延辟，皆辞人名士。”^②“常袞当国……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③这些都表明因战乱而遭冷淡的以诗赋取士的价值观念至此又在朝政中得以确立。因此，由天宝进士科文化培养出的一代士人又恢复了以诗赋求仕的热情，在战乱平息不久，他们又一次云集京城。他们逞名京都的愿望已被压抑了近十年，此时作为一种文化潜能又重新释放出来。他们都试图以自己的才华找回曾经失落的价值。可以说天宝进士科文化惯性是造成大历京城诗人群聚合的内在原因。

当时的京城也为诗人表现诗才提供了一个文化环境。在平乱中出现了一批勋臣权要。李泌曾建议肃宗对勋臣采取各权厚赏的策略，此法正为代宗所取。他多以赏赐之恩来保证勋臣对王室的效忠，又欲以京都皇家的排场与气派来恢复王室在盛世时的声望。这使得战乱后的

① 事见《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九《杨綰传》，页3434。

②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三《卢简辞传》，页4268。

③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九《崔祐甫传》，页3440。

长安出现了浮华奢侈之风。开、天盛世虽已离去，但是，新兴的权贵仍以豪华的贵族气派虚构出一个中兴幻象。如《通鉴》卷二三四“唐代宗大历二年”记：“（大历二年）二月，丙戌，郭子仪来朝，上命元载、王缙、鱼朝恩等互置宴于其第。一会之费至十万缗。”《旧唐书·代宗纪》记：“（三月）甲戌，鱼朝恩宴子仪、宰相、节度、度支使、京兆尹于私第。乙亥，子仪亦置宴于其第。戊寅，田神功宴于其第。时以子仪元臣，寇难渐平，蹈舞王化，乃置酒连宴。酒酣，皆起舞。公卿大臣列坐于席者百人。子仪、朝恩、神功一宴费至十万贯。”^①诗人则是这些宴集活动的文化点缀。元载、王缙这批由科举出身的新兴权贵，一方面既贪图盛世贵族的豪华气派，另一方面受其文化属性的作用，更好以文雅之事装点自身形象。因此，他们也广揽文人，大兴文场。现存的一批同题诗则记载了当时的一些盛会。如王缙于大历三年曾以宰臣身份赴幽州。其时京城诗人多参与了宴集送别活动。如皇甫冉、皇甫曾都作有《送王相公之幽州》^②，韩翃、钱起也作有《奉送王相公赴幽州巡边》^③。又如：“大历初，以新罗王卒，授（归）崇敬仓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充吊祭、册立新罗使。”^④皇甫曾、皇甫冉、耿伟、李益、李端、吉中孚等都作有《送归中丞使新罗》^⑤，大历十一年鲍防出为太原少尹、河东节度行军司马、权知河东留后^⑥，钱起、卢纶均有诗赠之。钱诗题作《送鲍中丞赴太原军营》，卢诗题作《送鲍中丞赴太原》^⑦。还有一些笔记资料也记载了当时京城宴集诗会的情况。如《国史补》卷上记：“郭暖（郭子仪子——

① 《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页286。

② 《全唐诗》卷二百五十。皇甫曾原题《送王相公赴幽州》，见《全唐诗》卷二百一十。

③ 韩翃《奉送王相公缙赴幽州巡边》，《全唐诗》卷二百四十五，一作张继诗，然由《因话录》所记“韩翃擅场”一事看，当为韩翃。钱起诗题为《送王相公赴范阳》，见《全唐诗》卷二百三十八。

④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九《归崇敬传》，页4016。

⑤ 见《全唐诗》卷二百一十、二百五十、二百六十九，吉中孚诗题为《送归中丞使新罗册立吊祭》。

⑥ 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三，页496，中华书局，1987年。

⑦ 《全唐诗》卷二百三十八、二百八十。

笔者注),平公主驸马也。盛集文士,即席赋诗。公主帷而观之。李端中宴诗成,有荀令、何郎之句,众称妙绝。或谓宿构。端曰:‘愿赋一韵。’钱起曰:‘请以起姓为韵。’复有‘金埒’、‘铜山’之句。暖大出名马,金帛遗之。是会也,端擅场。送王相公之镇幽朔,韩翃擅场。送刘相之巡江淮,钱起擅场。”又如《中兴间气集》卷下云:“自丞相以下,更出作牧。二公(钱起、郎士元——笔者注)无诗祖钱,时论鄙之。”可见,新贵们的豪宴正成了京城诗人的诗会。以十才子为主体的京城诗人群就是在这样场合中形成并得名的。现知最早关于“大历十才子”记载的是《册府元龟》卷七百七十七中所引的一段材料,其曰:“钱起与韩翃、李端、卢纶、司空曙辈十人俱以能诗出入贵游之门,时号‘十才子’,形于图画。”其后《新唐书·卢纶传》又曰:“纶与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伟、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①葛立方《韵语阳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应麟《玉海》亦采此说。但在宋代,对“十才子”究竟指哪十人,已有异说。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载“大历十才子,……卢纶、钱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端、李益、苗发、皇甫曾、耿伟、李嘉祐。又云:吉頊、夏侯审亦是。或云:钱起、卢纶、司空曙、皇甫曾、李嘉祐、吉中孚、苗发、郎士元、李益、耿伟、李端。”^②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还把冷朝阳列入“大历十才子”。其实这都是根据所存作品与各自的好尚来判断。所谓“大历十才子”并不是指大历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而是指大历年间活跃于京城诗坛的一个诗人群体。这些人各自诗风并不完全一致,各人存下的作品悬殊颇大。如苗发、吉中孚、夏侯审仅存一二首诗。而由姚合记载看,十才子之名非后人所加,而是当时即有。由姚合记载与十才子的作品看,他们在当时主要是以其群体性的创作活动而成名。这一现象与这一特点的形成是与当时的文化环境与文化走向是密切相关的。这本身就是大历士风的一种特点。从文化走向看,“十才子”的聚合与成名也是安史之乱平定后诗赋之士再

① 《新唐书》卷二百三,页5785。

② 《唐诗纪事校笺》卷三十,页813—814,巴蜀书社,1989年。